



中共中山本部县委旧址

为了加强对珠三角抗日武装的领导，广东省委决定将南海、番禺、顺德、中山等县的党组织合并，建立中共南(海)番(禺)中(山)顺(德)中心县委，简称“中心县委”，隶属广东省委。中共中山县委同时撤销。中心县委成立后，为了有利于抗战的进行，将中山县的党组织划分为中山本部和中山三、九区两个部分进行活动。1940年6月，中共中山本部县委在贝头里村成立。7月，中共中山三九区委员会（即三九区委）成立，隶属中心县委，8月，武装工作的

重点转移到九区。1940年6月，中山本部县委在贝头里召开了敌后工作会议，提出在国民党反动派大力反共的时候，中山敌后斗争的四项任务。第一，党组织要迅速恢复联系，又要注意隐蔽，保护和巩固好组织。第二，在逆境中要加强对党员的教育，继续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，坚定大家对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。第三，要积极探索在艰苦条件下坚持斗争的方法。第四，要建立党的主力武装，准备开展敌后游击战争。



孙康

孙康是火炬区沙边村人，1906年出生，1927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他在中山党组织的重建和发展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孙康服从国家安排，曾在云南省任职，继续为国家做贡献。孙康青年时期在县立中学读书，1927年参加了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卖蔗埔起义，被国民党通缉，1928年底辗转到了新加坡。他在当地报纸《檳城新报》上刊登文章，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孙中山的“三民主义”、“联俄”、“联共”、“扶助农工”的三大政策以及反对工农革命，一时间报纸销量大增，影响了不少年轻人，却也引起了国民党驻新加坡总领事的注意。



孙康

1937年初，中共中山县工作委员会在石岐成立，孙康任书记。8月，中共中山县委成立，他成为县委重建后首任书记。而中山县委也成为抗战全面爆发后广东地区首个重建的中共县委。他深知唤醒民众共同抗日的重要性，于是组织孙康了“中山话剧社”，走上街头、村庄进行演出，宣传抗日；他不仅在战斗中身先士卒，而且亲自主持开办党员训练班、游击训练班，培养了一批意志坚定、素质过硬的优秀党员和战士。孙康也非常善于团结抗日的力量，除了发动群众，他还说服了当时国民党的中山县长张惠长及其夫人积极抗日，在中山早期抗日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

中山抗战重要战役

击溃日伪“六路围攻”和“七路围攻”

1943年以后，日军为巩固其在华南的占领区，在打通广九铁路线后，连续向东江和珠江三角洲的游击区进行“扫荡”。五桂山区抗日根据地及敌后游击战的开展，好比一柄锋利的钢刀插进敌人的心脏，使盘踞在中山的敌伪感到极大的威胁。

6月，日军、伪军四十三师彭济华部出动4个团的兵力，从石门、合水口、长江、灯笼坑、马溪、石室桥等发动“六路围攻”，对五桂山抗日根据地地进行“围剿”。为了避敌锐气，保存力量，利用优势歼灭敌人，中山抗日游击队撤离石门、合水口的两处营地，转入大寮、长龙坑内的悬崖、峭壁、山洞之

【人物档案】

吕胜，1928年3月出生，中山古镇海洲人。1944年7月参加游击队，同年9月入党，1944年7月至1945年5月在梁伯雄大队任副班长、小队长，1945年5月至1949年10月任中山三区地下党西海武工队队长、三区区委委员，1949年10月至1976年10月任三区组织委员、区中队长、县委组织部干事、小榄镇委书记、镇长、县委工业部长、中山县委副书记、石岐镇镇长、书记、县生产组副组长、革委会副主任，1976年10月至1984年10月任中山糖厂副书记、书记，1984年10月至1989年3月任中山市政协副主席、党组副书记，1989年4月离休。

5 队伍解散转入地下工作

1945年初，珠江纵队成立，其中，第一支队梁伯雄大队驻扎在中山九区，即今天的黄圃一带。

1945年5月23日，即农历4月12日，伪军调动几个支队共三千余人攻打我们。当时，梁伯雄大队只有几百人，而且武器装备也不足，战斗力弱。

傍晚时分，天还下起了雨，我们自制的土炸药难以发挥作用。以上种种情况，都使我们处于不利位置。到了晚上，我们吃完晚饭，小队长就宣布，由于寡不敌众，为了减免不必要的牺牲，队伍暂时解散。我们把武器集中起来，沉到鱼塘里，同志们都暂时隐蔽起来。

在这次战斗中，我方受到重创，伤亡巨大，大队长梁伯雄、副政委郑文均不幸牺牲。

队伍解散后，我的党组织关系转到了新会。之后，我就一直在新会从事地下工作，没有转回部队。

启事

9月3日，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。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。为了缅怀抗战英雄，全方位展现中山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可歌可泣的历史，本报联合市委党史研究室，从3月至9月，每周推出缅怀抗战历史系列报道“致敬！峥嵘岁月”。敬请关注。



2014年6月20日，吕胜接受采访，讲述抗战经历。 林伟桦 摄

3 夜袭沙栏缴日军轻机枪

1944年10月，部队决定攻打沙栏。沙栏在今天的三角镇，当时那一带驻有一个伪军中队。这个中队硬件好、人数多、装备优，但许多是雇佣兵，缺乏战斗信念，因此战斗力并不强。战前的侦察工作由我负责。敌人的营房三间开，中间是大房，两边是小房，营房前还有一条河。中间的房子是给普通士兵休息，两边的房子则是给中队级、小队级的伪军干部休息。另外，我还了解到敌人有机枪，就在两侧的房间。我把情报及时向部队领导汇报，根据实际，部队决定采取夜袭的方式攻打沙栏。

战斗开始的时间是凌晨一点多，首先攻打敌方两侧的干部房间。当我们靠近的时候，发现营地有三挺机枪，其中一挺对着河涌，另外两挺对着哨岗。我们主力突击队从后面摸上敌人的哨岗，解决了哨兵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去，敌人根本来不及反抗。我们高喊“缴枪不杀！缴枪不杀！”河涌对岸也响起这种喊声，震慑住了敌人，几分钟内就解决了战斗。我们缴获了一挺日军轻机枪和30多条步枪。这次战斗，我们牺牲了一位同志。

战斗结束后，我们集中俘虏，宣传我们抗日的方针：愿意和我们共同抗日的，可以跟我们走；不愿意抗日、想回乡的，我们发一些盘缠，让他们回家。当时有4个人愿意加入我们部队，其他人给了一点路费，让他们离开了。

4 灵活多样打击日伪气焰

此后，在部队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，我多次参加战斗，捷报频传。伏击鬼子。当时我们在南头开沙驻防，得知驻守江门的一股鬼子，开着一艘电船巡逻，并在开沙一带登陆。副政委郑文马上布防，在开沙的一条三岔水道附近架设了一挺机枪，调动一个班驻防。战士们发现鬼子后，马上开枪，瞬间打死3个鬼子。鬼子散开后准备反击，考虑到敌我力量悬殊，我们便往黄圃方向

撤退。本次伏击战，我方无任何损失。“汉奸筹款”。我们驻地一带，有一个大汉奸，是顺德糖厂的厂长，他家附近还养了很多猪。我们决定向他“募捐”猪、糖等物资，这就是“汉奸筹款”。抓猪的时候，我们用石灰洒在猪眼上，然后再用一个大麻布袋把猪套起来。汉奸家附近有伪军，驻扎在炮台上。虽然伪军知道我们的行动，但他们没有袭击我们。因为我们所“募捐”的物资



2010年9月3日，纪念抗战胜利65周年，吕胜挥笔写下“攀登”二字。 黄李昌 摄

敬礼抗战老兵



2014年9月2日，老战士们（从左至右分别为陈占勤、吕胜、冯永）在五桂山古氏宗祠（珠江纵队司令部旧址），回忆往昔峥嵘岁月。 李国平 摄

2 在艰苦生活中保持乐观

部队的生活很艰苦。譬如，部队中没有专门的炊事员，每个人轮流煮饭。由于物资紧缺，很多时候都是盐水捞饭，经常不够吃，能吃到鱼、豆腐就很好了。平时很难吃到肉，只有在打胜仗之后，才能杀猪有肉吃。

尽管生活如此艰苦，我们仍学会了苦中作乐。有个战友梁荣，每次用鱼骨喂狗时，都会对着狗说，“汪精卫、汪精卫”，狗就摇头摆尾地走过来舔骨头。梁荣就对大家说，“看看汪精卫多馋嘴”，引得大家发笑。战士们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能够坚持下来，并且取得革命的胜利，都是因为我们共产党的士兵都是有信仰，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！

事实上，部队对战士的要求很严格。入伍之前，每个人要接受教育，只有有了一定的思想觉悟，得到组织同意，才能加入队伍。这就从源头上保证了队伍的质量，使党的政策能够得到有效执行。

另一方面，共产党的部队与群众联系相当密切。部队每到一个地方，班长、副班长都会带队深入基层，做群众工作。一方面掌握当地情况，另一方面了解群众对抗日的想法。过去，村民们开会的时候，地方的土匪恶霸都出来捣乱；后来，我们部队都派人参加，既听取群众意见，同时也有利于会议的顺利进行。通过这些小细节，群众了解到我们部队作风与其他部队不一样，是真正的抗日队伍，纷纷支持拥护我们。

1 16岁瞒着家人参加部队

我是古镇海洲乡人，在海洲小学读书。海洲乡长袁世根是小学的校长。小学毕业后，我留读夜校，继续学习培训。在此期间，我看了许多进步书籍。在日伪政府统治下，很多进步书籍都被禁了。校长袁世根就通过香港，转运了一些进步书籍回来。这些书籍主要是讲延安、讲抗日的。接触这些书籍后，我的思想进步比较快。16岁的我立志要保家卫国。

海洲小学有一个进步老师，叫李文球，是一名共产党员。1944年，我向他提出要参加抗日部队。趁着母亲和姐姐去耕田劳作的机会，我留下一封信，就离家参加了部队。

我参加的部队是九区的梁伯雄大队。梁伯雄大队是一支“白皮红心”部队，即挂国民党的招牌，由共产党实际领导。该大队辖七、八、九三个中队，其中第九中队是主力中队。我加入的就是第九中队。因为我是主动要求参加部队，并且有小学文化，而同期参加部队的同志文化水平偏低，所以我算得上是小知识分子。同年9月，我由副中队长梁冠介绍入党，当时才16岁。